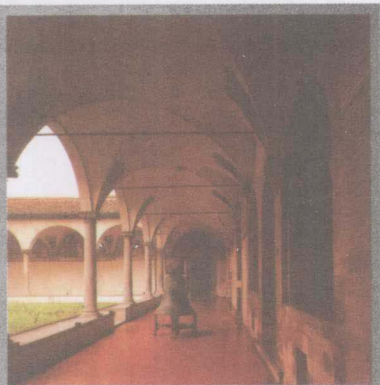


欧洲文艺复兴史

刘明翰 主编

A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



孙锦泉 徐波 侯树栋 著

欧洲文艺复兴史

史学卷



人民出版社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史

史学卷

刘明翰 主编 孙锦泉 徐波 侯树栋 著

K503
L652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美艳

装帧设计：曹 春

责任校对：高 敏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欧洲文艺复兴史·史学卷 / 刘明翰主编 孙锦泉 徐 波 侯树栋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01-008239-4

I. ①欧… II. ①刘…②孙…③徐…④侯…

III. ①文艺复兴—历史—欧洲②史学史—欧洲 IV. ①K503 K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5101 号

书 名 欧洲文艺复兴史·史学卷

OUZHOU WENYI FUXING SHI SHIXUE JUAN

著 译 者 刘明翰主编 孙锦泉 徐 波 侯树栋著

出版发行 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27

字 数 399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01-008239-4

定 价 54.00 元

总 序

历史长河，波涛起伏，滚滚向前。世界历史的画卷，纵横数万里，上下几千年。它既有暴风骤雨、电闪雷鸣的惊天动地时刻，又有漩涡险滩、曲折逆流的暂时倒退场面，还有那熠熠生辉、异彩纷呈的璀璨图景。多元景观和七色珠玑的文艺复兴，一如那异彩纷呈的图景，人们播撒着新的价值和理性精神的种子，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创建了独特的新观念和文明内涵，唱响出一首迈向新时代的高歌。

现在呈献给读者们的多卷本《欧洲文艺复兴史》，是国家社会科学规划的一个研究项目。它是我国首次系统地梳理和全方位地阐释欧洲文艺复兴思想精华的一次尝试，也是多层面地探究文艺复兴成果和历史经验的纵深耕耘。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一直以其思想和文化的恢弘灿烂而备受世人瞩目。文艺复兴发生在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过渡时代，是欧洲在意识形态层面开启的一场与封建文明决裂，在知识、科技、人文和社会诸领域中展开的一场新思想和精英文化的运动。它是以反封建、反天主教会、反对神学蒙昧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世纪晚期欧洲面临着总体危机。“阿维农之囚”后，教权下降，封建生产方式逐渐解体。人们由于信仰的失落和价值符号的错位，在时代转型的风云中，直面生存深渊，

渴望走出蒙昧的漫漫黑夜。学之染人，甚于丹青。欧洲文艺复兴画卷，充分揭示了先进文化和先进知识分子在历史关键时刻的启蒙作用。先进文化代表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灵魂，是促使社会进步的导向和动力之一，它发挥着震古烁今、振聋发聩的精神解放的作用。直接将新兴资产阶级推上了欧洲经济政治和文化平台的中央。

自14世纪初至17世纪30年代共三百余年的文艺复兴时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和精神象征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的特定概念，其主要标志是以人为中心，反对以神为中心，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文艺复兴并非古代希腊、罗马奴隶制文化的复活，而是利用古典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现实主义成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去反对封建的神学体系和经院哲学。人文主义在哲学观上表现为人本主义，政治思想上体现出民族主义，在伦理思想上集中表现为反禁欲主义，文学艺术上展现了现实主义。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强调以人为中心，主张发展人的个性、才智和自我奋斗，赞扬英雄史观；肯定现实世界和现世生活，向往享受、功利和致富，反对禁欲、悲观和遁世；否定对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绝对服从，嘲笑僧侣的愚昧，蔑视贵族的世家出身，反对封建特权和等级制；提倡理性，追求知识和技术，重视科学实验，反对先验论，主张探索自然，欣赏资产阶级新文化的语言符号系统和各种表现形态。

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把人看做一切事物的前提、最终的本质和根源。“以人为本”就是反对人被边缘化，强调人在宇宙中心的主体性，肯定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它同时是一种价值功能取向，尊重人的价值，肯定人是权利和责任的主体，描述人内心的丰富、刚毅和身体美；它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否定封建文化和神学的主导地位，提倡人的个性，树立人的自主意识。“以人为本”的提出，发挥了积极进步的历史作用。然而，社会的积壳层岩永远不是一朝所能凿穿的，疏浚如导壅，发明如烛暗，人文主义思潮随历史的发展，其体系也是逐渐丰满的。

欧洲文艺复兴如怒海波涛，“教会的精神独裁被摧毁了”（恩格斯语）。它敲响封建制的丧钟，改变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加速了民族国家的形

成，展示了近代曙光初露的黎明；留学意大利热潮中群贤荟萃，创造了精英文化；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获得了空前的繁荣；难以企及的佳作荣膺世界不朽名著之列；空想社会主义先驱者思想的萌育；近代自然科学和新人文学迎着暴风雨诞生。文艺复兴史的经验证明，必须同反动势力渊藪和落后传统坚持长期斗争，不畏强暴，殚精竭虑，艰苦实践，才能与时代同步，结硕果，出巨人。

二

一个半世纪之前（1860年），瑞士史学家布克哈特的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问世，他集前人研究之大成，又加以综合与发展，对文艺复兴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总结，把它作为一个文明整体加以阐述。这部巨著，是文艺复兴研究的奠基性著作，流传甚广，成为西方史学中关于文艺复兴史正统理论的基础。布氏摆脱了欧洲传统史学只限于政治、军事和外交史的传统，对先进文化加以颂扬，评析了人文主义，开始把政治同文化联系起来，在结构和体系上进行创新。但书中把中世纪视为黑暗时期，是当时史学界的偏见；全书没有艺术的内容，将文化成就主要归功于一小部分君主和统治者乃其缺陷。英国史学家西蒙斯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是同布氏观点接近的另一部正统派巨著，此书卷帙有七、内容浩繁丰富。设专章写美术和方言文学，专门论述了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将不同城市辟专题加以分析，对但丁、莎士比亚等均列有小传。但全书缺少经济背景，政治事件较多，范围仍窄，是其不足。布克哈特的研究方法和传统持续到20世纪，许多著作，如《剑桥近代史》第一卷《文艺复兴》等，均采纳布氏的观点。

20世纪初，尤其在30年代，西方史学界一度盛行反对和批判布克哈特的史学传统。以德国史家H.索德、法国艺术史家L.孔诺德，特别是美国中世史家C.H.哈斯金斯和L.桑代克等为代表，他们指出，“中世纪并非黑暗和静止”，中世纪文化中有文艺复兴的源流，认为历史发展只是连续的渐进，甚至否认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文艺复兴研究上传统观点与反传统观点有过激烈论战。但一批学者仍沿着布克哈特的正统的研究道路前进。他们的代表人是汉斯·巴伦、保罗·克瑞斯泰勒和欧金尼奥·加林。他们特别注意文化和政治、社会的结合,将文艺复兴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从文化社会学、人文学和哲学等不同角度补充和深化了布氏的立论,为全面研讨文艺复兴开辟了道路。

20世纪50至60年代,许多史学家在坚持布克哈特的传统的基础上,对布氏的观点和方法进行了修正和补充,进一步拓宽了文艺复兴研究的思路,即:在研究领域上开辟了新的方向;在研究方法上开展跨学科、多学科交叉的比较研究;拓宽史料来源,重视档案、文物典籍的作用;强调以点带面,将佛罗伦萨作为典型,探研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和变迁。这一时期有关文艺复兴的成果显著,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20世纪80年代后,文艺复兴的研究有了重大转折。西方史学界由于法国年鉴学派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新史学”运动的影响,在研究方向上更集中地转向社会史领域;研究对象上,逐渐从文化名人转向广大群众;从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对文艺复兴的概念、性质、时代和社会结构等基本理论性问题的辨析和定性上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同时又广泛重视了史料的更新,对研究领域则进一步拓宽。在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5年在斯图加特举行)的文艺复兴研究专门委员会的会议上,表现出各国学者对文艺复兴兴趣的明显提高。

20世纪末,各国学者对意大利以北各民族国家中文艺复兴的研究成果激增;对文艺复兴时期城市与社会生活,一些教皇对文艺复兴的态度的异同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经济、教育、建筑、妇女等诸多领域的探研均相继展开;特别是重视史料来源的扩大。这些在第十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95年在蒙特利尔举行)中有所反映。美国的六卷本《文艺复兴百科全书》(1999年版)对文艺复兴人物、事件分别有新的概述。

我国在80年代以前,关于欧洲文艺复兴史的研究基础薄弱,主要是少数学者对文艺复兴的背景、性质和意义作宏观分析,很少进行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80年代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20年来我国世界中世纪史

学会组织国内外学者们连续对文艺复兴史展开了一系列研讨,刊出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取得了初步的进展。

三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曾长期居世界前列,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有巨大贡献。中国的建筑技术、造船、航海、陶瓷与漆器生产等等许多工艺曾在世界领先。14世纪前,世界重要的科学成就和发明约300项,其中出自中国的约175项,占57%以上。但文艺复兴后期,由于西欧自然科学一系列发现、发明以及政治经济、海外贸易等都有新发展,而在封建围墙内长期徘徊的中国重农抑商、闭关锁国、文化专制,以致从这时起同西欧的差距拉开并逐渐扩大。我们祖国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的?落后的根本原因何在?从欧洲文艺复兴前后中西历史的对比落差中最能找到端倪。

恩格斯以高屋建瓴的眼界进一步对文艺复兴做出了高度也最正确的评价,他指出“这是一个人类从来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目前,我国对欧洲文艺复兴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全面、多角度地审视欧洲文艺复兴仍是一道难题。迄今,对它主体多层性研究阙如,薄弱和空白环节较多。我国作为一个拥有东方文明、地负万物、海纳百川的悠久古国,炎黄文化的精华博大精深,传承文明和借鉴中外文化精华,历来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我们必须坚持辩证唯物史观的指导和“国人治史”要夏独造的胆识,宏观和微观相结合,进一步开拓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恩格斯对文艺复兴的正确评价作为这部丛书全面贯彻的指导思想,充分探究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欧洲文艺复兴史》分成各有主题而又互有联系的十二卷,即:总论卷、经济卷、政治卷、哲学卷、科学技术卷、文学卷、艺术卷、教育卷、法学卷、宗教卷、史学卷、城市与社会生活卷。这样多卷本的范围和规模,在国内尚属第一次。我们力求恪守严谨、创新的原则,在汲取国内外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体现出“自得之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全书的基本框架虽统一，但各卷出自众手，写法和文风、笔调不可能也不必千篇一律。我们由衷的愿望是想通过这部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可鉴之镜。

回眸自2001年起，全体作者以求实的学术品格，齐心协力，迎晨霜晓露、伴午夜孤灯，焚膏继晷，辛勤笔耕，其合作态度和钻研精神令人感动。本书的框架、重点、难点及各卷初稿，是在四届审稿会反复切磋和研讨后解决和定下的。每卷的内容和文字都经由编委会成员和主编审定。尤为感人的是本书得到人民出版社领导和历史编辑室主任乔还田编审、责任编辑杨美艳的大力支持、督促和具体指导，特此衷心致谢。尽管我们努力进行创新探讨，但有关欧洲文艺复兴史的系统研究，在我国还起步不久，尚在不断衍化发展之中。我们的学力不逮，限于水平和资料，各卷中不可避免地会有论述欠充分或粗疏漏误之处，渴望得到专家、学界同仁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刘明翰

2007年3月



导 论

“人文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在文艺复兴的不同时段，有它不同的历史文化内涵。历史的连续性和循序渐进，使我们在文艺复兴的肇始阶段很难以“人文主义”为历史界碑与中世纪截然划断，从而区分出泾渭分明的两个时代，这也是哈斯金斯等人为什么要写《十二世纪文艺复兴》的理由。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人本意识在增强，理性思维能力和人生价值判断也在渐次提升，“人文主义”本身在不断地充实、丰富和完善。当历史演绎完文艺复兴全程，作为历史概念的“人文主义”也就负载了业已形成的近代文化赋予它的全部内涵。同样，近代史学也是历史的概念，是随着以文学为载体的“人文主义”发展而催生出的近代人文学科之一。中世纪的神学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却分衍出了整个近代人文学科，“流入”与“流出”截然相反的文化走向，或许也是这场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专制文化彻底颠覆的一项内容。科克伦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和历史编纂学》中指出：人文主义从它的发端便带有文学道德的缺陷，需要被另一个可能称为更专业的研究形式所超越，这就是历史学科存在的缘由。顺着他的思路，我们也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复兴或新兴的各个学科中总是带有文学深深的印迹，为什么某些文学写作方式和修辞学规范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编纂学能产生那样持久不衰的影响，为什么人文主义史学最初发端的史学流派是修辞学派。

就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史学而言，已有一些学者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修史背景、史料选择、撰史方法、内容结构、史著风格、语言文风、历史观念等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分析和研究，探索在所谓“复兴”的古典主义表象后，人文主义史家这个群体在始终流动的时空坐标中的演变。

从20世纪的下半期以来，至少有三部著作颇有影响。一是D.J.威尔科克的力作：《15世纪佛罗伦萨人文主义历史编纂学的发展》^①，20世纪60年代末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部史著中，作者对15世纪佛罗伦萨三个历史学家布鲁尼、波吉奥和巴托洛缪及其作品进行了分析和叙述，重点是布鲁尼，同时也照顾到了鲜为人知的巴托洛缪。他依据15世纪佛罗伦萨人文主义历史写作特点指出，布鲁尼在《佛罗伦萨人民史》中“历史真实的概念”引导出了一个新的历史写作范式，认为15世纪的这些历史学家们对历史编纂学作出了卓越贡献。为此，威尔科克勾勒出了一个人文主义历史编纂学对古典史学发展的轮廓，论证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对15世纪人文主义历史编纂学提供了一个新的阐释。在史著中他也特别指出汉斯·巴隆(Hans Baron)市民人文主义的概念和保罗·奥斯卡·克里斯泰勒(Paul Oscar Kristeller)所强调的人文主义修辞学特征对这一时期史学研究的重要性。

这部史著在研究方法上也试图作创新的尝试，威尔科克依据原著，紧扣三位历史学家关心的问题以及他们历史研究方法的基本要素进行论述分析。

E. 科克伦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和历史编纂学》^②是研

注
释

① 参见 D. J. Wilcox, *The Development of Florentine Humanist Historiograph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② 参见 E. Cochrane, *Historians and Historiography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究意大利文艺复兴史学的又一部重要著作，该著作涉猎广泛，论述周详，博学的科克伦对凡是涉及15世纪初到17世纪初意大利史学的任何人和事都有所评议。E.科克伦以时间和地理为经纬，纵横意大利，通过对众多的历史学家历史行为、品质和著作的分析，系统地论述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历史编纂学的发展路径，揭示了不同于中世纪编年史的新时期历史编纂学的一般规律和特征。

对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历史编纂学科克伦至少提到了以下特点：一、历史修撰遵循李维、修昔底德等史家的古代范式；二、在历史中寻找为政治用途和道德教育的真理；三、按照时代的要求以批判意识构架叙事体信史；四、历史写作的世界性阐释；五、晚期阶段近代民族意识的产生。

对于意大利历史学的分期，科克伦是这样认为的：人文主义的历史因为1494年外敌的入侵而戛然而中断，因之，应在15世纪末划断，16世纪中期以后则是“后人文主义时代”。他将修撰《特伦托会议史》的威尼斯专史作家保罗·萨尔皮（Paolo Sarpi, 1552—1623年）称为后人文主义时代的先驱。

总之，这是一部很有影响且有分量的著作，F.E.鲍曼称为“主题篇幅分量很重的权威性评述”。^①科克伦的著述有助于我们在写作中作宏观的思考和微观的检点。

1983年出版的E.弗莱德《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历史编纂学》^②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史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这部专著是由七篇论文组成，其特点是参阅了大量文艺复兴时期的手稿及文献资料。弗莱德博士亦是一位文献学专家，他对文献本身的研究亦有很深的造诣，他根据法比奥·维吉利（Fabio Vigili）1508—1510年整理汇编的财产目录清单，研究过15—16世纪美第奇图书馆搜寻手稿的详细情况，经过他鉴别后认为仅1494年一年的收藏中，便有1100多份原稿和复制品。他论著中专门有一篇论文是：《洛伦佐·美第奇：历史编纂学与原始资料评述》，他的著作不仅利用了这

注
释

① F. E. Baumann, "Historians' Historians" 载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45, No.2 (Apr., 1983) p.293.

② 参见 E. Fryde, *Humanism and Renaissance Historiography*, The Hambledon Press, 1983.

些珍贵的资料，更为重要的是对这些资料进行了一些新的分析和研究，不乏研究心得和真知灼见。另外，他著作中的不少史料都是从未披露过的，这也给著作本身增色添彩。该著不求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编纂学作全面论述，只是在有史料支撑的一些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譬如对布鲁尼的《新西塞罗传》、瓜里诺的斯特拉博《地理学》翻译、瓦拉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波洛蒂的《波利比安》等作阐幽发微的研究，这些研究信息给学者们提供了各种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诚如牛津大学的乔治·赫尔米对他的评价：E.B.弗莱德的论文“给文艺复兴时期研究古代史料的方法带来了光明。”^①可见，这是一部史料可靠，论述翔实，富有原创性的研究专著，也是我们在写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中大量参阅E.B.弗莱德研究成果的重要原因。

20世纪后半期，法国史学界对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史学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对该时期法国历史学术发展路径的探讨以及对法学、法学家与近代史学、近代文化的关系研究，成为史学界研究的热点。迈伦·吉尔摩的《人文主义者与法学家》（1963年）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创性著作。拉诺·马丁内斯《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法学家与治国之术》（1968年）是探讨法学与政治文化关系的佳作。尤其是朱利安·弗兰克林的《让·波丹与16世纪法学和史学方法的革命》（1963年），率先探讨了16世纪法国的法学研究对史学方法的影响。到70年代，随着研究的深入，成果也更有分量。乔治·赫伯特的《完美历史的观念：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历史博学和历史哲学》（1970年）是对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历史思想的研究。唐纳德·R.凯利的《近代史学的基础：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语文学、法学与史学》（1970年）研究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史学对近代史学的贡献。这些著作都是这一时期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研究的力作。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凯利的论著沿着弗兰克林的路数，深入讨论了法学对历史学的作用，进一步阐发了意大利学者加林40年代提出的，近代历史学源于人文主义语文学的观点，探究了

^①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102, No. 404(Jul., 1987), p.713.

法国史学对西方近代史学的贡献。80年代布雷萨赫发表《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史学》一书,明确指出了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史学发展路径的独特性,认为其关键一步是出现在法学领域。前人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使我们能捋清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史学的发展线索,进而把该时期的法国史学发展不仅看做是语文学、法学与历史学交互影响、彼此促进的过程,而且是法兰西民族史的开创过程。我们认为,恰恰是在创立民族史的过程中,法兰西觉醒了历史意识,开始了历史批判,奠定了近代历史学术的基础。^①

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史学是英国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学者对此做了不少研究,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不断有新成果推出,这些成果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福斯纳的《历史的变革:1580—1640年英国历史写作与思想》(1976年),安东尼亚·格兰斯登的《英国历史写作:1370年至16世纪早期》(1982年),唐纳德·R.凯利主编的《近代英国早期的历史想象:历史学,修辞学和虚构》(1997年),沃尔夫的《阅读近代早期英国的历史》(2000年)。还有一些通论性著作,如丹尼斯·哈伊的《编年史家与历史学家:8至18世纪西方史学》(1977年),波伊亚的《从古代到1800年伟大的历史学家》(1989年)等。《文艺复兴季刊》等国外期刊中也有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史学史的相关论述,如唐纳德·R.凯利的《欧洲近代早期的文化史写作:克里斯多福·米勒和他的著作》(1999年第2期)以及两篇关于16世纪英国教会史学家约翰·福克斯的论文:约翰·N.金的《印刷业的光辉:威廉·廷代尔,约翰·福克斯,约翰·戴与近代早期出版文化》(2001年第1期)以及莎伦·阿钦斯坦的《约翰·福克斯与犹太人》(2001年第1期)等。

安东尼亚·格兰斯登的著作《英国历史写作:1370年至16世纪早期》是较为重要的一部著作。作者独具慧眼地指出“人文主义史学”是中世纪史学的延续,我们看到的侧重点是变迁而不是颠覆。作者还深刻评价了英

^① 徐波:《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民族史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2页。

国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写作的主要特征及亮点,以及对英国后世史学的影响。此外,书后的附录包括许多重要原始文献的翻译节选,显示出作品的原创性价值。

唐纳德·R.凯利主编的《近代英国早期的历史想象:历史学,修辞学和虚构》是一部论文集。所收录的论文乃是1993年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的结合本。该论文集的出版代表了学术界的一种发展趋势,即历史学家与文学家开始互通有无。历史与文学两大学科开始逐渐打破原有的禁锢,尝试着互相利用对方的研究成果,以期形成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模式和理念。本书收录的文章便是这种理念与发展的集中体现。书中各篇论文体现了一种有机的交叉学科的特点,探讨历史学的同时也包含文学、政治学的内容。

沃尔夫的《阅读近代早期英国的历史》可被视为一部浓缩的英国书籍史,特别注重对历史书籍的考察,其结论是更多的历史被写成、散布并阅读。非专业读者可以通过该书了解许多关于手动印刷时代作者、读者、书籍制作与销售方面的知识。他不仅利用了早先使用过的文献,还进一步开发引用了许多新的档案文献,颇具说服力。

在本卷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史学的写作中,体现了我们对上述研究成果的借鉴。

总之,在本书的写作中,我们充分利用了国外学术界长期以来文艺复兴时期史学研究方面的学术积淀,特别是权威性著作和新近的研究成果,尽可能获取学术前沿的一些重要研究信息,以使这部著作在保证成果原创性的同时,具有相应的学术含量。

二

纵观欧洲主要国家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既有其普遍规律和共同特征,也有因国家、地区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但文化的本质是相同的。一般说来文艺复兴时期史学有如下特征:

其一，古典主义倾向。

彼特拉克复兴古典学术的理念引导了文艺复兴的一批史家去探究古典史著的精要，效法古代史家的语言、文风、撰史方法、史学思想。因之，形成了学术活动的古典主义倾向，进而完成对中世纪编年史的彻底颠覆。在这方面，意大利先期的一些史家尤其典型。

布鲁尼和波吉奥在古典著作的收集、整理、翻译、抄录方面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布鲁尼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狄摩西尼、普鲁塔克、波利比安、普罗科皮厄斯、色诺芬、埃斯基涅斯等人的古典希腊著述译成拉丁文，为尔后的研究扫清了语言障碍。波吉奥誊写抄录了搜寻的各类古代稿本，培训了一些职业誊录员，引导了职业誊录员训练之风的兴起，大批古典稿本的誊录，对吸收古人的智慧、知识、理论、方法和观念，传播古典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英国史学家常常前住意大利收集和阅读古典著作手稿的译本，比如英国编年史家惠瑟姆斯提德是在意大利的帕维亚阅读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皮埃罗·德·蒙特收藏的荷马史诗的拉丁文抄本，^①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色诺芬和普鲁塔克等人作品的拉丁文版本。^②之后的英国史学家中约翰·利兰注重在英国本土收集整理散失在民间的手稿，他认为收集手稿“意在使古代作家的作品……或许能摆脱默默无闻的状态，为世人所知”^③。德意志的伊拉斯谟从古希腊、罗马著作到早期教父经典，进行过大量的梳理和研究。法国学者皮图醉心于古代碑铭及史著的广泛搜集和比照研究，他认为要理解高卢和日耳曼社会，必须重视恺撒和塔西佗的记载。西班牙史学家则更多体现出本土主义倾向，他们对西班牙出生的古典作家以及历史人物的著述具有浓厚的兴趣。

在历史著作的写作中，人文主义史家更是对古典史著广泛的借鉴和征引，无论在修史目的、史著构架，还是内容、方法、风格方面，古希腊、罗马的史学遗风，渗透了意大利人文主义先师布鲁尼的史著。法国学者博杜

注
释

① A. Gransden, *Historical Writing in England II: c.1370 to the Early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1982, p.373.

② Roberto Weiss, *Humanism in England during the fifteenth century*, Oxford, 1957, p.33.

③ 保罗·G·巴恩主编：《剑桥插图考古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安汇通了古代历史和中古历史的编纂风格,形成了他整体历史的特有格调。帕基耶则遵从古罗马大师瓦罗的博学风尚,编排自己的历史谱系。

英国的史学家惠瑟姆斯提德通过引用古典格言加深论述,在著作中,还申明古典作品的引证,以期引起读者的重视。约翰·海沃德极为推崇古典史家,特别是塔西佗。他以塔西佗的著作为范例,在写作中总习惯于引章摘句,培根认为他甚至将塔西佗的句子翻译后直接使用,有剽窃之嫌。

在史著的体例上,意大利史家布鲁尼的《佛罗伦萨人民史》从结构、内容和谋篇布局上深受李维的影响,李维的《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为其提供了参照和仿效的原型,按主题排序,以地域分类,用叙事写作,摈弃了编年史体例,以年代顺序关注于叙事主线的进展。^①而英国史学以古典著作为典范,突破了中世纪编年体为主的单一模式,回复到了叙述体和纪传体上。同英国一样,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出现了以叙述体为模式的通史、断代史、国别史和专门史等各种史学著作。

在史学思想方面,一些古典史学思想又激发了人文主义史家古为今用的意识和欲望,从古典思想文库中获取精神力量,为现实社会服务。萨鲁斯特和塔西佗对共和政体的历史学阐释,有助于布鲁尼对佛罗伦萨民主共和制的认知,而波利比安和色诺芬对古典希腊城邦狭隘的民族诉求,又引发了布鲁尼佛罗伦萨城市国家民族历史观的共鸣。波吉奥从塔西佗著作中提炼出的共和思想使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共和体制下的佛罗伦萨反对维斯孔蒂专制统治下米兰斗争的特殊意义。^②他引证历史,从古代的典籍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寻求衡量现实社会的标尺。崇尚古典史学思想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理性的回归和从神的历史到人的历史这一转变。如果说中世纪晚期修道院编年史家在思想上并没有脱离神的历史这一基督教史学永恒的主题,那么其后兴起的各国城市编年史便开始摆脱将历史认为是神意的体现。最初的人文主义史学家在神意决定论中加入了一个二级理念,认为上帝的意

注释

① 参见 D. J. Wilcox, *The Development of Florentine Humanist Historiograph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35, p.110, p.107.

② 参见 A. Momiglian,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120-121.